

崔贵强·古鸿廷 合编

东南亚研究丛书之二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中

教育出版社



DTK(33)37
1

Education! Publications Bureau

承印：光华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教 育 出 版 社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九七八年四月初版

東南亞華人問題之研究

崔貴強、古鴻廷合編



教育出版社

作者簡介

王 賡 武	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院
古 鴻 廷	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學系
宋 明 順	新加坡南洋大學社會與心理學組
吳 燕 和	美國東西中心文化研究所
崔 貴 强	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學系
張 震 東	新加坡大學社會學系
楊 進 發	澳洲佛蘭德斯大學歷史學系
廖 建 裕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
劉 子 政	砂朥越業餘作家
顏 清 湟	澳洲亞德烈大學歷史學系
韓 銑 豐	美國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地理學系

目 次

導言：東南亞華人的今昔	崔貴強、古鴻廷	1
華人、華僑與東南亞史	王廣武	27
論南洋華人民族主義運動之研究	古鴻廷、張震東	33
海外華人與中國的經濟現代化1875-1912	顏清滄	47
東南亞華人及其前途——		
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的衝擊	宋明順	60
泰國華人的同化問題	崔貴強	87
沙巴海南人職業型式之演變	韓銑豐	101
砂勝越華族遷移史的研究	劉子政	122
山東籌賑會與陳嘉庚	楊進發	141
新幾內亞華人社會的商業發展	吳燕和	148
印尼華人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廖建裕	160

導言：東南亞華人的今昔

崔貴強 古鴻廷

華人移殖到東南亞來，追源溯流，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我們的祖先在求生本能的驅使下，不惜離鄉背井，飄洋過海，赤手空拳到海外闖天下。他們以過人的膽識，勇猛的精神，秉承着克勤克儉的中華傳統美德，在東南亞各地胼手胝足，流血流汗，對東南亞的開拓與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页可歌可泣的史詩，值得我們去頌揚。這種大智大勇的精神，值得我們去學習。

最早到東南亞的華人，是官方使節與僧侶。遠在漢武帝時代（140-87 B.C.），隨着中印關係的建立，即有官方使節乘着古代帆船，從廣東沿岸商港啟程，沿着南中國海徐徐南下，穿過泰南的克拉地峽，在緬甸南岸駐足，轉程到南印度去。他們帶來了中國的「黃金雜繒」，通過了物物交換的方式，把東南亞的「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帶回到中國去（1）。此後，中國歷代王朝與東南亞諸古國的使節往還，斷斷續續，歷久不衰。至於往西天求法的中國僧侶，從中國循海路到印度去，東南亞亦是必經之道。自東晉高僧法顯從印度渡海東歸以來，歷南北朝（420-581），隋朝（581-618）與唐朝（618-907），由海陸兩路往西天求法的中國高僧，絡繹不絕（2）。不過，早期足履東南亞國土的中国官方使節與高僧，都只是路過此地，並無定居。約從宋代（960-1127）以來，中國與東南亞的海上帆船貿易，逐漸擴展，華商以中國的陶瓷器及絲綢等物，換取東南亞的香料及奇珍異物（3）。自宋代以來，歷經元朝（1279-1369）、明朝（1368-1644）與清朝（1644-1911），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海面上穿梭飛揚，載來了中國的勞動人民與商品，運回去東南亞各地的土產。直至十九世紀末葉，帆船貿易才漸趨式微。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1870 年标志着欧洲新帝国主义的肇端，在此后二三十年间，欧洲列强捲入了空前未有的侵略狂潮，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落后国家成了俎上肉，西方列强扩大了在东南亚的土地侵略。与此同时，欧洲经过了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到瓜熟蒂落的阶段。于是在殖民地掠夺原料，开拓市场，成了西方列强扩张殖民地的重要目标，这时候也就进入第二个侵略的阶段。为了达至这个目标，政府努力安定地方秩序，提供了经济开发的有利条件。同时西方的剩余资本，也蜂拥到东南亚各地来投资！资本与劳力，是构成地方发展的两大因素，因此政府积极努力与资助外来的移民。

自 1860 年英法联军之役后，缔结了中英北京和约，规定了中国政府不得禁止华民赴英国所属各地或外洋工作，并得查照情形，会订章程，以谋保护。此后，中国政府便抛弃了过去施行的海禁政策，移民出国不受阻拦。

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劳力需求的殷切，与中国对移民的放任政策，再加上交通的畅通，中国南方港口与东南亚各地有定期轮船往还，导致了华南移民纷纷移到东南亚来。

在本世纪首三十年间，东南亚的经济处在黄金时代，亦即华南移民的浪潮达致巅峰的状态。这一来，东南亚华人的人口激增，社区的组织跟着庞杂，经济活动呈现多样化，政治意识渐趋浓郁，文化事业蓬勃开展。

直至本世纪卅年代初期，世界经济恐慌的阴影，笼罩全球。影响所及，东南亚各地经济衰退，百业凋疲，市况萧条，各国政府遂实施移民限制条例，华南移民浪潮于是受到阻遏。第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政府的桎梏，宣告独立自主，移民限制条例，更是雷厉风行，此后东南亚华人人口的繁衍，完全来自自然增殖率了。

战后以来，东南亚华人的处境，迈进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纪元。在这个阶段里，许多政客都把当地华人视为经济剥削者，剥夺了当地土著的生计，阻碍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从而立法掠夺华人的经济权益，动摇了华人在当地千百年来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根基。在某些国度里，排华运动此起彼伏，摧毁了华人的生命与财产。与此同时，当地一些华人政客，也认为华人的传统社会组织与文化发展，助长了华人对中国的效忠意识，窒息了华人认同于当地社会的思想，于是提出了同化华人的论调，企图彻底摧毁华人的传统意识与社会组织。在这情况下，华人今后的生存与社

会文化的發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几个世纪以来的东南亚华人的历史，其内容是多姿多彩的，以下是分门别类，粗枝大叶，给它勾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一) 经济活动：在十六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尚未伸展到东南亚来以前，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帆船贸易上。那时候，闽粤沿岸的华人，利用季候风的吹送，往还于中国与东南亚的海面上，他们带来了中国的商品（其中以陶瓷及丝绸为主），带回去东南亚的土产（以香料及奇珍异宝为主）。数个世纪以来，海上贸易使一部份华人积聚了不少财富。等到十六世纪西方势力东来以后，定居东南亚的华人逐渐增多，于是海上贸易的原始累积，逐渐转化为商业、农业、矿业及工业资本，构成了东南亚经济网重要的一环。

华人的经济活动，虽渗透到各个行业，但商业资本显然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我们虽无确切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但苏联史家 N. A. Simoniya 却勾稽了残缺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立论（4）。

商业资本的投资可分两方面，即对内贸易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及对外贸易的出入口商，就中以前者的资本较大。

就对内贸易来说，华人是扮演仲介商或买办的角色。原来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大致上呈金字塔型，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的是占绝大多数的土著，殖民政府锐意把他们束缚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中层是华人，居中间人的地位，其任务一方面是搜集农村的土产，交到西方企业家的洋行，转运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是将西方的工业产品，辗转分销土著手上。最上层是人数绝少的欧洲人，凭着其财雄势大及政府的庇护，垄断了庞大的商业机构，外洋航运与金融事业，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

就对外贸易言，华人的出入口商亦直接促进了东南亚各国间之土产交流，同时也将东南亚的土产运送到远东（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市场去。至于将土产直接输出到欧洲去的，数量有限。对外贸易货品以稻米，橡胶与木材居多。

华人的农业资本较小。在廿世纪以前，主要分布在茶叶，咖啡，甘蔗与香料的栽植。但廿世纪以后，主要栽植的经济作物有橡胶，椰子与油棕，不过由于财力的薄弱，华人的农园大多是小规模的。

华人的工业资本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的加工。加工的产品主要有白米，木材，蔗糖，食油，橡胶及其制成品。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说到华人的矿业活动，以开采锡矿为主，集中在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但自廿世纪以后，在西方企业的雄厚财力与先进技术的竞争下，华人的矿业显然处于劣势。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私人企业资本尚未涌入东南亚，华人的资本已渗透到各种行业，虽然鉴于资本的薄弱，行业的规模不大，但却能独当一面。但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东南亚各地，其活动面之广，概括了工农商业，金融业与航运业，其雄厚的财力与科学的管理技术，远非华族所能比拟，华族资本遂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依赖西方资本而存在，沦为所谓「半封建」「半买办」的经济型态，这种主从关系一直延续到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在大恐慌的浪潮冲击下，华族企业顶不住迎头打来的巨浪，纷纷倒塌。此后，华族资本家才领悟到完全依赖西方资本而生存的危险性，遂逐渐将资本加强消费品（如胶鞋，轮胎，胶管，椰油，罐头食品，米较业及棉织品等）的投资。这种制成品主要供应本地市场，不甚受到世界物价波动的影响。

华人的经济活动，严重地受到其社会结构的影响。华人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建立在地缘与血缘的基础上。属于同一宗族或区域的群体，相互提携与扶掖，因此在经济结构上便出现了某一行业由同一群体垄断的现象。这种情形阻遏了华族资本走向近代资本主义，而停滞于早期资本主义的阶段（5）。

战前华族经营的企业存在着很多缺点。许多工商业家大都抱残守缺，很少创新，他们的口头禅是：「那些对我祖辈是好的，对我也是好的」。这造成了他们眼光短浅，斤斤于眼前的利益，缺乏了长期计划的雄图。

华人的企业经营，很重视宗族与同乡的关系。僱主极力聘用亲朋戚友当僱员，充满了裙带气息。这种忽视人才主义的作风，浪费了许多无谓的开销，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无法与西方的企业竞争。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资本家，目光如炬，突破裙带关系的桎梏，敢于聘用学有专长的专家帮忙主持业务，以致鸿图大展，发展大规模的企业。如印尼建源公司的黄仲涵（6）；新加坡和丰公司的林秉祥（7），都是很好的例子。华族企业的忽视人才主义，也导致了组织的松管，管理的欠善，从而阻碍了业务的跃进。

战后有许多政客为了达致其政治目的，过份渲染华人在所在国的财富，诬蔑华人控制了所在国的经济，剥夺土著的经济利益，这是不符事实的。据美国学者 H.

G. Callis 的统计，可得表如下：

国别	华人投资额 (百万美元)	外人投资额 (百万美元)	统计年份
英属马来亚	200	454.5	1937
荷属东印度	150	1411	1937
菲律宾	100	315	1937
法属印支	80	384	1941
暹罗	100	124	1938
缅甸	14		

由表所示，在第二次大战前几年，除了暹罗以外，西方资本家在东南亚各国的投资额还比华人的来得大，证实了华人的经济剥夺论是不能成立的。

战前华人的经济活动既是东南亚经济网重要的一环，构成经济活动的主力之一，所以华人的经济活动虽没有受到殖民政府的庇护，但大体上来说，也没有受到抑制或摧残。华人的传统社会结构，殖民政府也听其自然发展。至于华文教育，除了星马政府于廿年代严加管制，泰国自卅年代末期銓披汶当政后对华教横加摧残外，华教的生机仍枝叶繁茂。可是到了战后卅年来，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种情势已大大改观，华人的处境面临严重的挑战。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政客，曾高唱「经济爱国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的论调，其最终目标是摆脱对外国的经济控制，谋求经济独立。这原是无可厚非。但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步骤与手段去实现。倘若只求达致目的，不择手段与后果，那么，欲速则不达，反而带来不良的效果。

在「经济爱国主义」的大纛挥舞下，华人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华人被视为垄断了国内的经济，侵犯了土著的权益。

政客以「经济爱国主义」为工具，作为赢取群众支持的政治资本，依仗了政治力量的优势，立法限制华人经济活动的领域。

在泰国，远在 1938 年銓披汶当政后，便颁布了一连串限制华人经济活动的禁令，逐步由政府经营，或由泰人接办。这些营业包括米较业，盐烟业，水陆交通业，捕鱼业与燃油业。1942 年，泰国政府颁布了「保留泰人职业法令」，1952 年把限制外侨的职业范围加大，1958 年，乃沙立元帥 (Manchal Sarit) 的军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人政府更变本加厉，扩大保留泰人职业的种类。迨至乃他依 (Thanom Kitthikhha Chorn) 军人政府倒台，临时革命政府执政后，复于 1972 年颁布管制外侨行业法令，其范围包括农工商业及服务业，可谓无所不包了。

在印支，法国殖民政府对华人并没有施以限制法令，但战后的情况就不同了。1956 年，南越吴廷琰政府颁布了禁止外侨经营十一种商业法令。同年，柬埔寨政府也颁布禁止外侨经营十八项行业。

在缅甸，华人处境更恶劣，在 1962 年尼温军人政权执政前，缅甸政府已将若干企业逐步推行国有化，但鉴于国内民族资本薄弱，国人欠缺工商业之经验与技能，手段颇为和缓。但自尼温上台后，缅甸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措施大刀阔斧，政府极力维护土著利益，积极推行国有化政策。运输业与娱乐事业之经营，不再发执照给外侨，私营商店与金融业都遭受解体。在这狂风暴雨的侵袭下，华人首当其冲，生活顿失依靠，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在印尼，华人的经济活动也严受限制。1959 年印尼政府宣布爪哇乡村由外侨经营的零售业，一概得在短期内结束营业，由印尼土著接收，而政府也没有给外侨适当的赔偿。华人几个世纪以来在乡村建立起来的传统基业，一夜之间，全部付诸东流。华人经营的运输业与工业，也因为政府不再发给新执照，无从扩展。为了使印尼土著有更多机会参与外国投资者的联合工商业投资，非印尼人被禁止与外资联合经营工商业。印尼政府也着手使印尼工商业的较大股份移入印尼土著手中，政府有意收购在印尼之华人商业中五十至六十巴仙，并将股份售卖给印尼土著。而已跟华族商人联合经营的外国投资厂商，华人股东须将其五十巴仙股份售卖给印尼土著。这一连串的措施，动摇了印尼华人的经济根基。

在菲律宾，政府种种的非化法令，亦把华人排出传统的经济圈外。零售商非化法案，华人经营零售的机会被剥夺了，米黍非化案，将华人过去建立的米黍业根基，连根拔除。劳工非化案，使大批华籍劳工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此外，银行的非化，专门职业的非化等等，真是法令如毛，一浪高过一浪，华人处境的恶劣，也就可想而知。

(二) 政治活动：东南亚华人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一部份华人在东南亚已定居了好几个世代，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一部份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产下了后一代的混血儿。这些土生土长的华人，在星马被称为 Babas 或 Strait-born Chinese，

在印尼被称为 Peranakan Chinese，在泰国被称为 Lukjin，在菲律宾被称为 Mestizos，在越南被称为 Minh-haong（明乡）。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土著文化与传统中华文化的冲击下，他们成了各个文化的结合体。在政治意识的表现上，大体上对中国政治较冷漠，对当地政治较热中。另一部份华人是近数十年来从中国移植过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他们仍然保有传统的中华文化，并不认同于居留国的社会。在政治意识的表现上，热中于中国政治，对当地政治却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

华人社会中不同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政治意识，是相当复杂的。为了廓清这种繁复的画面，王赓武教授企图把不同政治意识的华人分为三个群体来说明。其实，东南亚各国华人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与政治意识并非完全一至，故王教授的三个群体划分标准，也不能完完整整套用在东南亚整体华人的身上。虽然如此，其三个群体划分论仍不失为探讨东南亚华人政治意识的良好标准。

王教授的划分标准如下：第一个群体（Group A）直接或间接与中国的政治发生连系，他们关怀中国的政治发展，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结合起来。第二个群体（Group B）采取较现实的政治态度，他们较关怀和商业及社团有关的间接政治问题。他们缺少长远的政治目标，对政治并不热中，深信一切政治都根植于金钱与社团上，他们都是有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一群。第三个群体（Group C）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并不掺入中国政治的漩涡，却参与殖民政府或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活动（8）。

十九世纪之际，一般学者大都认为这时候东南亚华人的社区并不庞杂，大多华人是文盲，为谋求生存而克勤克俭，只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宗族观念，缺少政治意识。这种说素，并不全然正确。其实，第一群体的华人，已表现其政治态度与活动，他们通过了私会党的组织，隐约地表现了反满清与反传统的情绪，他们以生为中国人而自豪。至于第二群体的华人，却孜孜追求名位，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使他们聚集了不少财富，有的便向清廷购买官衔，来提高其社会地位，实际上他们缺乏了明晰的政治效忠对象，给人一种机会主义与骑墙派的感觉。不过，要清楚划分第一与第二群体也有困难，第二群体当中的部份领袖，他们同时表现了多方面的政治态度与活动，他们一方面与土著统治者及殖民地官僚扯上关系，另一方面又活躍于华人私会党的组织。说到第三群体，大多吸收了西方与土著的文化，逐渐消失了华人固有的传统特质，他们投身于当地土著或殖民政府的政圈内，帮忙统治者治理华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人，这种情形，以泰国、星马、与荷属东印度群岛最为显著。

到了十九世纪末与本世纪首四十年间，由于内外因素的刺激，使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意识愈来愈浓郁与多样化。所谓内在因素，是在西方殖民政府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人遭遇到虐待与歧视，苛捐杂税，自由行动受限制，其中尤以荷属东印度群岛与西班牙属的菲律宾群岛，华人的处境最恶劣。这一群「海外孤儿」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当地派驻领事，或通过外交的途径，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与人身安全，刺激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兴趣。所谓外在因素，包括了清廷对海外华人政策的转变，由敌视转向护卫。清廷除了竭力设置领事馆外，更经常派遣文武官员，到海外来抚慰与视察，企图争取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归向（9）。与此同时，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本世纪首十年，在东南亚各国展开活动，为了争取东南亚华人的支援，保皇革命两党积极创办华文报章，开设书报社。两党政治思想的迥异，导致了激烈的文字争论，这对东南亚华人政治思想的启蒙，无异产生了极大的催化作用（10）。到了中华民国成立，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华人的争取，不遗余力。除了在东南亚各国派驻领事外，更经常派遣政府代表到东南亚来抚慰与视察，协助当地华人成立国民党支部，指导发展华文教育，进而企图在校内部实施「党化教育」。中国政府的国籍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不论在任何地方出生，都一律是中国国民。到了廿世纪卅年代的后期，有更多政府代表到东南亚来，鼓动当地华人展开「抗日救亡」运动，这无疑加强了中国政府与东南亚华人的政治联击，激发了当地华人对中国政府的效忠（11）。

在这个阶段里，第一群体的华人表现了炽热的政治意识与行为。他们有的认为清廷是中国传统的合法政权，支持苟延残喘的满清政府。有的以康有为的「勤王」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康有为的「士」族身份，赢得了当地中上层阶级华人的崇敬与支持。也有一部份华人（以中下层居多），服膺于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号召，出钱出力，甚而回国投身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牺牲。

随着本世纪首四十年日本侵华的扩大，使第一群体的华人的政治意识，升华为强烈的政治行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8年的「济南惨案」，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都导致了华人的反日运动（12）。自1937年「七七芦沟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空前的怒潮。抵制日货，捐

款账济，回国服务，组团慰劳，充份表现了华人的爱国思想与行为。「抗日救亡」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上自资产阶级，下至贩夫走卒，都捲进了这场运动的漩涡。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场运动的展开，突破了华人传统的帮派主义的框框，把华人团结在共同的旗帜下，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成立，就是华人团结的具体表现（13）。可以这么说，东南亚华人的爱国行径对中国的抗日胜利作了相当大的贡献。

在这阶段里，第二群体的华人占大多数。表面看来，他们似乎不涉及政治，因为他们不公开从事本地与中国的政治活动。但他们仍然有效地组织起来，以便适应日益复杂局势的需求。他们传统的宗族与公会组织，不足以维护其利益，因此，他们组织起来，保证与当地殖民政府及其邻邦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在不损害到其崇高地位的情况下，他们乐意参加倾向中国的政治活动。

这阶段里的第三群体，人数较少。他们当中，有的仍具有中国的政治意识，有的迷恋于殖民政府的恩宠，有的同情当地土著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试以印尼的 Peranakan Chinese（土生土长或混血的印尼华人）的政治意识来说明。代表中国政治意识的是所谓「新报派」。其实，「新报派」并非一个政治组织，只是一群具有中国政治意识的印尼华人，利用他们创办的「新报」的华文及印尼文报章，宣扬其共同的政治思想。他们拥护印尼华人大团结，鼓励土生土长的华人子弟接受华文教育，主张华人应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他们拒绝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们相信，参与当地政治，将导致华人社会的分裂。他们认为中国会维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只有跟中国连击起来，才能生存发展。代表迷恋荷兰殖民统治的是中华会（Chung Hwa Hui）的政治组织。他们来殖民政府的态度，引起了一些华人的非议，诋毁他们是荷兰政府的「忠实」子民，敌视印尼土著，意图分裂华人社会。此外亦有同情当地土著民族主义运动的，是印尼中华党（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的组织。其目标是要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上协助印尼走向统一的国家形态，企图加强土生土长华人的经济地位。主张与印尼的政党合作，展开政治斗争，用宪制的手段来争取印尼的独立。更有部份印尼华人，成为印尼共产党党员，投身于反帝反殖的政治斗争（14）。

至于星马的海峡侨生（俗称峇峇），一般而言，其政治意识与活动，大都是效忠大英帝国与海峡殖民政府，他们也以大英帝国子民而自豪。但在十九与廿世纪交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替间，清廷、保皇与革命三股势力在星马的活动，曾导致若干海峡侨生领袖的思想激荡。他们热望中国能变法图强，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当风闻百日维新运动失败，他们当中竟有人黯然垂泪。海峡侨生的优秀领袖如林文庆，伍连德，曾锦文与阮添筹等人都毅然回中国服务。不过，就战前的星马而言，除了马共与少数极端的左翼马来份子外，根本就没有反帝反殖的运动。对海峡殖民政府，海峡侨生谄媚巴结唯恐不及，自然不会反政府了。

自 1945 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运动汹涌澎湃，殖民地的人民纷纷摆脱殖民政府的桎梏，自己当家作主。同时，中国大陆风云变色，中共建立了统治中国的政权。随着亚洲政治局势的发展，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意识亦起伏激荡。总的来说，战后初期，尤其是 1949 年以后，第一群体的华人中，一部份已转化为第二群体，而第三群体也愈来愈认同于当地社会，投入当地政治活动的洪炉，效忠当地政府。其结果是，第一群体人数的锐减，与第二、第三群体人数的激增。

战后开始不久，一般东南亚政府与人民对华人采取以下两种看法，即：（一）华人是中国政府的第五纵队，构成了外在的威胁；（二）倘若任由华人的经济势力配合着动荡的政治势力的发展，就会构成内部的隐忧。因此，如何转移华人的政治思想，使他们从亲中国转移为亲本地政府，是战后东南亚政府努力不懈追求的目标。

以上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虽然仍有少数华人仍固步自封，坚守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但却有更多华人认识到现实的需要，已然逐步扬弃了传统的中国思想，认定本地为第一故乡，乐意成为本地的公民，效忠本地政府。本地政府应该根除对华人的恐惧，给予华人公平的待遇，肯定华人对过去与今后发展东南亚的贡献的价值，这将会更能促进华人的认同感。

就战后东南亚华人的政治行为而言，介于 1945 年与 1949 年国共内战期间，第一群体华人对中国政局变化的反应是强烈的，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也是波澜壮阔的。到了五十年代，这种政治行为仍然余波荡漾，但六十年代以后，除了少数极端份子外，大体上已消沉了。

当国共内战期间，星马两地华人因拥蒋与反蒋的不同政治立场，导致了华人社会的大分裂，树立了两个壁垒森严的阵营。拥蒋的势力以各地国民党支部、三民主

义青年团、中华大会堂与中华总商会为主，当然这期间的中国驻星马领事与总领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反蒋的势力则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左翼工会为主。双方通过了其各自主办的报章，唇枪舌剑。有时候，他们甚至诉诸武力。

随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一群体的华人中，除了少部份与中共或马共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外，大部份华人已逐步转移到本地的政治思想与行为。这种转移表现在各地中华总商会的积极参与本地政治活动。华人领袖政治思想的转移也大有人在，李孝式与刘伯群，即是显著的例子（15）。

战后初期中国政局的激荡，也导致了泰国华人社会的骚然。拥蒋与反蒋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引起了泰华社会的分裂。曼谷中华总商会成了两股势力争夺的地盘。有一段时期，反蒋势力甚是庞大，但随着泰国政府的积极反共，才将左翼势力镇压下去（16）。

印尼华人的社会，也因为拥蒋与反蒋的政治斗争，呈现了分裂的局面。华人社团、学校与报章，都卷进了斗争的漩涡，一片混乱。

至于在这阶段的第二群体的华人，仍然居多数。虽然其中一部份已融合到第三群体去，但也有部份第一群体的华人飘流到第二群体来。随着政局的激烈变迁，他们采取了较现实的政治态度。他们固然一方面期待中国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又期望东南亚新兴国家取得真正的独立，而北京或台湾政权将不会因海外华人问题向新兴的民族主义势力挑战。总之，他们希望东南亚国家的现状能维持下去，而他们也尽力去适应东南亚新的环境。不过，他们不愿意看到其后裔完全同化于当地社会，也不愿意看到华人社会的决裂。虽然他们乐意多少与中国的政治断绝关系，但在文化与语文方面，仍愿意保留华人的身份。他们自认是东南亚的华裔，如「马华」、「泰华」与「印华」等等（17）。

在马来亚联邦，第二群体的华人于 1949 年组织了马华公会。马华公会是一个种族性的政党，它标榜为华人争取利益，不过，它也是反共的，其成立的一个目的，即是表明马华并不与马共同流，马华是效忠当地政府的。虽然马华并不为所有第二群体的华人支持，但它的出现是合时宜，符合多数华人的需求。马华与巫流的政治结合，在战后马来亚联邦的政坛，居于支配的地位。

关于第三群体的华人，长久以来即与中国摆脱关系。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既不足恃，遂与当地殖民政府及土著政府合流，以谋自力更生。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政局